

世界冷观察系列

国际关系中的 野蛮与文明

Barbarians and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rk B. Salter

【英】马克·B·索尔特 / 著



新华出版社

国际关系中的 野蛮与文明

〔英〕 马克·B·索尔特 著
肖欢容 陈刚 原丁 陆同 译
肖欢容 麻争旗 校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际关系中的野蛮与文明/ (英) 马克·B·索尔特著; 肖欢容等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4. 1

(世界冷观察系列) ISBN 7-5011-6481-9

I. 国… II. ①萨…②肖… III. 国际关系—研究 IV. 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2344 号

京权图字: 01—2003—5121 号

Barbarians and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pyright © Mark B. Salter 2002

Barbarians and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irst published by Pluto Press.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3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luto Press Ltd, London.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版权属新华出版社

国际关系中的野蛮与文明

〔英〕马克·B·索尔特 著

肖欢容 等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编: 100043)

新华出版社网址: <http://www.xinhupub.com>

中国新闻书店: (010) 63072012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北京振宏福利印刷厂印刷

*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120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一版 2004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6481-9/D·1026 定价: 20.0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010) 65895562 65897685

致 谢

我要感谢我的家人一贯而毫无怨言的支持。当我在大学一年级的時候，要求购买《新现实主义及其批评者》一书作为圣诞礼物的时候，我母亲准确地猜到我是不会成为一名律师的了。家是我温馨的港湾，没有他们的爱和支持，我是无法做成现在的一切的。在整个过程中，我全家都表现乐观，我对他们的谢意是无以言表的。Stuart, Mary, Patricia, Hunter 和 Kay，谢谢你们。我的祖父母不时地塞给我食品、火车费和他们的智慧。我的同胞们也给予我许多帮助。我要谢谢这些“好人”：Meredith Browne, Adrianne Gaffney, Sara Levin 以及 Kaley Walker，谢谢他们亲密的友谊。

本研究项目的顺利进行，得益于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類研究学会的支持。我也要感谢英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科学系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本书的第三章和第九章曾提交国际研究学会，这两章的主要观点得到了必要的批评意见。我特别幸运的是有一个好的博士导师小组。在 Kal Holsti 教授的监督下，我得到了基本的职业训

练。Rob Walker 教授就本书的思想线索给予了必要的指导。在英国哥伦比亚大学，Sam Laselva 教授为我的疑难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解释。我也要感谢 Simon Dalby 在本项目结束时给予的支持和帮助。Patrick Thaddeus Jackson 和 Jacinta O'Hagan 是本项目咨询者。我也要谢谢 Eddie Keene，我在伦敦经济学院时《千禧年》杂志的编辑。对 J. P. Sewell 早期的鼓励，我也要表示特别的谢意。

我也感谢普洛托出版社 Roger van Zwanenberg 为本书所做的努力。

我还要感谢 Pamela Ritchie 在百忙之中整理本书的手稿。

千言万谢的话语最后属于我的妻子 Kate，她是人们梦寐以求的那种伴侣，我有幸认识到了这一点。

2002 年于开罗

目 录

致谢.....	(1)
1、导论	(1)
2、文明与野蛮人	(10)
3、野蛮人的帝国	(36)
4、文明/野蛮的欧洲	(87)
5、新野蛮人	(122)
6、学科的非殖民化:忘记帝国主义的过去 和现在.....	(154)
7、新野蛮人、旧野蛮人:后冷战时代的国际 关系理论.....	(174)
8、结语:文化、认同、文明与野蛮人回归 国际关系.....	(211)
后记:新野蛮人、新文明和不是新的冲突.....	(220)
注释.....	(228)
参考书目.....	(262)
译后记.....	(281)

1. 导 论

在尼罗河沿岸的卢克索寺外，有一个交通标志牌，上面写着“遵守红绿灯是文明的表现”。五年之后，留心每一个“文明”话语的运用，这个用英语写的交通标志似乎暗示了路的尽头。这个规劝所针对的对象是说英语的游客，而并非当地的阿拉伯人，这似乎恰好表明了国际关系研究中关于“文明的冲突”争论的利害关系。我在卢克索寺发现的，不仅仅是维护伊斯兰教的认同产生的对源源不断的西方文明影响的抗拒和对全球化的抗拒。在卢克索寺，我更发现了对这种难以避免的文明之间、文化之间、或者是伊斯兰与西方世界的“冲突”观念予以反驳的证据。

卢克索是一个在许多历史阶段都非常有名的地方，而卢克索寺，更是一个文明间对话的最好明证：公元前1414年，埃及国王阿孟霍特普（Amenhotep）三世建造了卢克索寺；公元前1333到1323年间，图坦卡蒙（Tutankhamun）国王进行了续建；公元前1290年到公元前1224年，该寺遭到著名的拉梅斯（Rames）三世

的毁坏；公元前7世纪，亚述人入侵埃及；后来，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32—23年）入侵埃及。公元200—300年，科普特人^①把内部的圣所（inner sanctum）变成了教堂，毁坏了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代之以象征着基督教的图画。13世纪，穆斯林入侵，他们在法老的庙里建了一座清真寺。这座寺庙是现在矗立在巴黎协和广场中心的方尖碑的来源。最近一次是1997年，恐怖分子在卢克索寺袭击了参观哈奇伯苏特女王（Queen Hatshepsut）寺的游客。当代，作为全球化符号的主要标志，是无所不在的麦当劳，是随着当年的法国入侵和托马斯·库克船长涌进来的无数游船，或是那些操着多种语言叫卖卢浮宫美术馆和大英博物馆的赝品的小商贩。在卢克索寺，或者是说在埃及，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与西方世界，以及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复杂关系。

笔者先从目前的情况说起。在卢克索寺的恐怖袭击，总共使68名西方游客和埃及人丧生，这似乎印证了塞缪尔·亨廷顿有关暴力伊斯兰复兴的论述。由于大众和学界把穆斯林定义为恐怖分子，再加上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给人的印象，这次恐怖袭击被西方媒体看作是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分子抵抗西方支配和反对全球化的“自

① 7世纪伊斯兰教传入埃及后古埃及人中仍然保持科普特教信仰者的后裔。科普特教属于基督教东派教会之一，原为古埃及人所组成，因认为基督神与人二者已结合为一性，故亦称“基督一性论”派。——译注

然”而“典型”的体现。旅游业是卢克索地区地方经济的支柱，但袭击使其在不到三年中萎缩。伴随着卢克索寺与全球资本市场和消费文化联系的被切断，卢克索地区的经济凋敝了。

埃及政府部门多次试图否认这次恐怖袭击。然而在袭击发生一周之后，当局试图用一场“葬礼仪式 (funeral ceremony)”来消除危险的形象，葬礼以威尔第式的“愤怒的眼泪和烛光”结束。¹ 大众传媒谴责伊斯兰极端分子发动的袭击，也批评政府在解决产生社会分化根源问题方面的失败。² 正如一位评论家强调的，“惟一可以描述卢克索寺袭击的罪犯的就是他们是这个国家（埃及）的叛徒。”³ 宣称对这次袭击事件负责的 Al-Gama 组织通过其发言人表示，恐怖分子的行动并没有得到他们组织的首肯。⁴ 在西方人看来，这次袭击特别有趣的是伊斯兰宗教当局也对袭击进行了谴责：“埃及领头的宗教学府，阿尔阿扎哈 (Al-Azhar) 清真寺的大教长穆哈默德·塞义德·坦塔维 (Mohamed Sayed Tantawi) 说，‘这是犯罪行为，这种行为违背了伊斯兰教义。’”⁵ 埃及政府新招募了将近 30000 名警察，启动了新的安全措施以保护富裕的西方游客，而不是埃及人、纪念碑或者遗产。不管怎样，这次袭击所宣称的目的是为了释放 Al-Gama 组织的领导人奥马尔·阿卜杜勒·哈曼 (Omar Abdel-Rhman)，他因“1993 年策动图谋炸毁世贸中心而被关押在美国”。⁶

尽管这产生了像关注全球化、旅游地理学和政治伊

斯兰等有趣的问题，但笔者对这一事态的关注在于将它作为“文明的冲突”的范例。简而言之，像穆斯林兄弟会这样的温和派组织在埃及境内为他们的伊斯兰信仰寻找到大量的支持者，而激进的伊斯兰组织在经济、宗教和政治上都不被接受。⁷

然而，在西方人的想像中，每个穆斯林都是潜在的恐怖分子。在亨廷顿蹩脚的“文明的冲突”话语中，这个形象多次得到重复。

写这本书的想法源于我不满意对亨廷顿“文明的冲突”论断的有关批评。“文明的冲突”的观点，已经成为当代关于后世界理论化的试金石（后冷战，后殖民，后结构，后现代，后福特，后现实，后两极；总之都是“后某某”）。在他的第一篇关于“文明的冲突”的文章中，亨廷顿提出的理论囊括了所有后冷战时代的忧虑：全球化、文化、民族特性、宗教、原教旨主义、野蛮主义和文明的衰落。他认为，文化集团将是日后世界舞台上的主要行为体，文化和认同（identity）是冲突的主要坐标。比起之前的像冷战时代那样的理性冲突，这些冲突更具有煽动性，更加难以平息，因为认同和文化是零和博弈式的冲突。然而，只有建构出边缘化的“他者（other）”的时候，对“文明”的描述才有意义。在亨廷顿发掘出来的帝国主义话语中，野蛮是文明的天敌。在他的世界新秩序的范畴中，亨廷顿把伊斯兰文明解释成幼稚的、原教旨主义的和无领导的、甚至是野蛮的。亨廷顿把后冷战时代描述成美国的时代，美国站在西方

文明之巅。他警告说，除非西方世界在美国领导之下，而且美国保证承担领导的义务，否则，西方文明国家将会“要么团结一致，要么杂乱无章”。⁸

虽然很多学者已经注意了亨廷顿观战的经验诉求，但是很少有人去考虑其政治含义和他的思维中暗示的帝国主义遗产。埃及，特别是卢克索寺惨案，使他的话语得以放在不同的后殖民主义的视角中。为了挑战这种关于后世界的表述，本书大量借鉴国际关系学者的思想，他们使用文化和认同概念来理解世界政治。他们中的佼佼者，如 R·B·J·瓦 尔 克 (R. B. J. Walker)、里 查 德·K·阿 什 利 (Richard K. Ashley)、戴 维·坎 贝 尔 (David Campbell)、詹 姆 斯·德 代 朗 (James Der Derian) 和 迈 克 尔·夏 皮 罗 (Michael Shapiro)，都是从后结构主义的立场介入国际关系。⁹ 为了丰富这种学术对话，本书探讨了国际关系领域内“野蛮”的比喻 (trope) 以及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政治中发掘出来的大众的国际想像。

对野蛮的比喻我们是熟悉的：没有礼貌，语言粗俗，缺乏道德，没有组织，野蛮人体现的是对文明人的暴力威胁。¹⁰ 野蛮人的空间位置表明了政治共同体的界限；野蛮人的分布，无论是单独还是群居的，都处于城邦的外部。尽管这个现象并非西方所独有，但在本书中，笔者关注的是欧洲/西方关于文明与野蛮的话语。¹¹ 雅 克·德 里 达 (Jacques Derrida) 就认为二元结构在西方哲学中扮演了首要作用，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也不能

例外。在本书中，我试图解构文明与野蛮的二分法，并阐述这种二分法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文明/野蛮的话语也让我们注意到帝国主义以及这样的事实：即帝国主义一度是我们理解国际关系和国际关系史的核心，然而，在对主权/无政府状态的传统国际关系的论述中，又出现了帝国主义缺席的现象。进一步说，“野蛮”体现了一个话语源泉，整个 20 世纪的政治家们都在从中汲取养分，现在仍然如此。

“文明”话语的重新流行是作为新的“文明的现实主义”出现的，其目的是试图在后冷战秩序中重新描绘帝国主义的地形图。这一举动有着双重作用：一方面把西方表述为不存在问题的，另一方面把众多的非西方文化野蛮化。正如坎贝尔和夏皮罗所说：“对那些几乎不带道德关注、利用文明话语来对待他们的‘文明’边界之外的事物的人来说，道德观和地形图的重叠从历史上看很明显。”¹² 本书的意图是，对贯穿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有关文明/野蛮的话语进行考察，并阐述这一话语在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理论化中的政治功用。

本书在方法论上属于后结构主义。这种知识谱系强调“文明与野蛮”话语中的变化、混乱、移位。通过研究这些无序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欧洲/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轮流变化。

本引言在于介绍本书将会讨论的一些理论对话。第二章将探讨文明与野蛮话语这两个关键概念的含义和语源学内涵。总之，野蛮人在共同体边缘的存在是持续

的，这有助于共同体内部和共同体边界的政治行动合法化，即使野蛮人本身随时间在改变。本书的重要目标就是要填补国际关系理论的空白，展现当代世界存在（后）殖民现象。为了体现亨廷顿理论的历史渊源，我将考察欧洲帝国主义对野蛮话语的使用。第三章将考察1798年后欧洲帝国主义一些重要的理念层面。笔者认为，帝国主义扩张是欧洲特性的核心，文明/野蛮的对立是殖民主义理论的核心。我将特别考察埃及的个案，把其作为人口、直观性和种族成见定势（stereotyping）的典型。这些种族纯化、人口威胁和直观性在帝国主义宗主国中也有体现。第四章讨论了在世纪之交时，欧洲流行的紧张形势是如何体现在“文明/野蛮”话语中。加上尼采的哲学怀疑论的影响，欧洲开始对帝国主义措辞失去信心，斯宾格勒和弗洛伊德的作品都证明了这一点。文明使命开始显现出衰败的迹象，特别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其可信性丧失殆尽。希特勒自称野蛮的德国要把德国和欧洲野蛮化。第五章考察了“文明的欧洲/野蛮的他者”话语。纳粹思想中的国际关系和帝国主义的联系将被重点关注。这一章还透过反殖民作家的视角，探讨了纳粹的残暴，这些反殖作家如艾枚·塞赛尔（Aime Cesaire）和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把“文明/野蛮”话语重新与帝国主义联系到了一起。殖民地解放运动对世界和国际关系秩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第六章考察了把帝国主义从国际关系理论中抛弃的理论趋势。第七章探讨的是围绕亨廷顿“文明的冲突”

论断的批判性争论。在讨论亨廷顿的论述之外，这一章还探讨了本杰明·巴伯（Benjamin Barber）、罗伯特·开普兰（Robert Kaplan）与亨廷顿有关的争论。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认为亨廷顿的文明式的现实主义把后冷战时代重新刻上了殖民主义的世界观的烙印。亨廷顿在他的论断中有四个主要的政策规定：放弃非洲文明，美国需要警惕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的联系，美国在西方文明中的领导地位，美国国内重新民族化。只有第一个观点曾经被当代作家评论过。本书的结论表明，在后冷战时代大众国际想像中，帝国主义思潮复活是危险的。

我沿着一部分学者的道路展开研究。这些学者研究的重点在于帝国主义含义和后殖民状况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后殖民理论，或者后殖民主义，主要是关于帝国主义、东方主义和文化的。更具体地说，它是关于帝国主义形态征服的根源和发展。¹³后殖民主义与国际关系理论相互探讨过去，虽然他们探讨类似的权力与控制关系。¹⁴达比阐明了把后殖民主义理论对文化和思想的关注与国际关系理论对权力和物质控制的关注相结合的效用。¹⁵一批学者曾经试图证实这些问题对当代世界政治的影响。¹⁶达比和保利尼展示了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一些概念，在评价世界政治中的作用。¹⁷多蒂也遵循了类似的研究方向，认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不加分辨地采用南北对立的视角，产生了类似殖民主义分类的效果。¹⁸《国际关系中的野蛮与文明》延续这个争论，用类似的

分析手法对文明/野蛮的二分法进行探讨。

当前国际关系中文明与野蛮话语的碰撞体现在三个领域。第一个是司法领域，考察特定的国际法律环境。赫里特·贡戈（Gerrit Gong）等学者探讨帝国主义和国际社会的法律话语。第二是对外政策分析领域，多蒂等学者考察了特定的帝国主义国家是如何利用文明与野蛮对立和并将之具体化的。第三个探讨“文明”本身的话语，分析了这个词具体在政治上的使用。艾弗·诺伊曼（Iver Neumann）、哈辛塔·奥黑根（Jacinta O'Hagan）和帕特里克·撒迪厄斯·杰克逊（Patrick Thaddeous Jackson）都已经在这个领域内开展研究。我把自己的工作也算在第三个领域内。

我在开罗的学生们非常熟悉亨廷顿提出的观点。他们认为他对伊斯兰世界的界定是歪曲事实的。¹⁹但是，正如亨廷顿在他对批评的反驳中所讲，“如果不是文明，那是什么？”，经验上的分歧不是他论点最重要的部分。接受亨廷顿关于后冷战时代的世界观，无异于把 19 世纪的世界观强加到当今世界，这才是真正的危险之处。这种殖民主义的世界观强加出一系列涉及发展、全球正义和干预的伦理等观点。通过考察野蛮话语从 19 世纪之交伴随着文明的出现，以及最近的 21 世纪初这一话语的重新发掘这一演变过程，笔者试图给“文明”的结论提供一个论证的空间，而不是接受其世界观赋予的冲突、零和博弈和不可避免的暴力这种假设。

2. 文明与野蛮人

在更大的冲突中，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冲突是全球“真正的冲突”。世界上各种伟大的文明，因为它们在宗教、艺术、文学、哲学、科学、道德上的成就以及内在的冲动，会相互之间产生融合或者冲突。¹

亨廷顿引用作为高度发达的文化的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冲突，表明了这些术语作为认同集团的功能以及认同、文化、文明和野蛮之间的联系。

认同 (identity)

“认同”的观念笼罩在认识论的争论、学术的纷争和定义的模糊性之中。尽管概念模糊，“认同”一词显然是政治话语的重要主题，值得认真分析。因为个人认同和集团认同的形成“是与其本身之外的世界相关的”，所以认同政治是国际关系首要关注的内容。² 亨廷顿为

认同提出了一个临时定义作为他论点的开始：

人们是根据自己的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制度来认识自己的，他们使用政治不仅仅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利益，也是为了界定自己的认同。只有我们知道自己不是谁的时候，并且通常当我们知道我们在反对谁的时候，我们才能知道我们是谁。³

亨廷顿提出的认同的定义是古怪的、静止的、不变的，是建立在简约主义的“我/他(self/other)”二元论结构基础上的。他对“认同”和“利益”做了观念上的重要区分。一方面，“认同”被理解为各个个体相信他们自己是谁、以及他们所生活的共同体的局限性。另一方面，“民族利益”，这个充其量是一个不稳定的词语，被理解为一个共同体的目标。尽管这些目标可能包括了对认同的保护，但亨廷顿不仅仅把认同定义为利益的集合，他还强调了认同过程中的积极与消极的层面，这在后文会详细叙述。尽管对“他者(other)”或者外界可能有一系列的反作用：可能是仇视外族，也可能是东方主义；“他者”从定义上不是被边缘化了，或者就是从共同体中排除出去了。亨廷顿还说：“心理学家普遍认为，个人或集团界定他们自己的方式在于，将他们自己与他者区分开来或将他们自己置于他者的对立面。”⁴后结构和后殖民理论家们则把认同看作是差异。